

# 评“三家村”

——《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姚文元 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評“三 家 村”

——《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

姚 文 元 著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1 9 6 6 年

# 評“三 家 村”

——《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

姚 文 元 著

\*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紹興路54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01號

大眾文化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

開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張 1 字數 20,000

1966年5月第1版 196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300,000

統一書號：3074·441 定價：(五) 0.08 元

四月十六日，《前綫》和《北京日报》发表了題名为《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話〉的批判》的材料，并且加了一个編者按。这个“編者按”說：“本刊、本报过去发表了这些文章又没有及时地批判，这是錯誤的。其原因是我們沒有实行无产階級政治挂帅，头脑中又有着資产階級、封建階級思想的影响，以致在这一场严重的斗争中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这是一篇大謊話。《燕山夜話》的作者是邓拓，《三家村札記》則是邓拓、廖沫沙、吳晗合股开办的一个黑店。邓拓担任了《前綫》的主編，又把持和垄断了北京市的思想文化工作領導崗位，他同“三家村”的伙計們一起，把《前綫》《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猖狂地执行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路綫，充当了反动階級和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难道只是一个什么“丧失警惕”“沒有及时地批判”的問題嗎？放出了这許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难道头脑里只有那么一点点資产階級思想“影响”嗎？对这个大騙局需要彻底揭穿。

人們都还记得，在《海瑞罢官》批判刚开始时，邓拓是装作正确的姿态出現的。在經過一番紧张的筹划策謀之后，邓拓化名向阳生，写了一篇名为《从〈海瑞罢官〉談到“道德继承論”》的长文章，在《北京日报》《前綫》同时发表。这是一篇以“批判”吳晗的姿态为吳晗救命的文章，是彻头彻尾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北京日报》《前綫》同时大登邓拓“批判”吳晗

的文章，这难道只是什么“丧失警惕”么？这难道是什么“放松了文化学术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么？不，完全不是，他們的“警惕性”是很高的。他們对向党和人民进行的“阶级斗争”是抓得很紧的。当时看看吳晗的問題掩盖不住了，慌忙由邓拓出来搞假“批判”；反面人物唱久了，要装正面人物，总是装不象，露出了不少马脚。现在，看看邓拓也保不住了，又急急忙忙用編輯部的名义出来搞一个假“批判”，頑强抵抗，阻碍斗争进一步深入。但装得更不象，马脚就露得更多了。什么“沒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什么“沒有及时地批判”，統統是騙人的，无非是想用“批判”邓拓及“三家村”的幌子，把自己装作还是站在正确方面，欺騙讀者，欺騙党。

采取这种态度，怎么可能把問題說得清楚呢？怎么可能去“展开严肃的批判”呢？按語中說：吳晗“一而再、再而三”地“为被撤了职的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张目”，这件事他們曾經想掩盖，但早就掩盖不住了，现在只好被迫承认；按語中又說：廖沫沙是“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一員主将”，可是在末尾說到邓拓呢，只是“吹捧死人，頑固地提倡向死人学习”，“大量地宣传了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只字不提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这就使人很难相信了。一百五十多篇《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中許多毒草，只是提倡“向死人学习”嗎？只是宣传了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嗎？只是一个思想錯誤而不是政治問題嗎？“三家村”有两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而另一家写得最多的反而只是“提倡向死人学习”而已，这在邏輯上說得通嗎？高高举起，輕輕放下，假批判，真蒙混，无非是演一

出“批判”的戏給人們看，以抗拒党中央的指示，这不是很清楚的事嗎？

配合这个按語而整理的《〈燕山夜話〉究竟宣扬了什么？》一文，虽然长达两版，却同样掩藏了尖銳的政治問題。几个部分的标题是：“歪曲党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主张让資產階級思想泛滥”，“全面美化封建社会制度”，“借封建古人之尸，还資產階級之魂”，“宣扬剝削階級沒落的人生哲学”，“以古諷今，旁敲側击”。标题表现着編者的傾向和判断。这种編法从側面告訴讀者：《燕山夜話》沒有或极少反对党中央、毛主席和支持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的内容，与《海瑞罢官》性质不同。把歪曲双百方針醒目地放在第一部分，把“以古諷今”放在最后，寥寥数語，輕描淡写，略加点綴，勉强凑了两条，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編者苦心所在。

我們一查对，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大量十分恶毒地誣蔑党中央和毛主席、支持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攻击总路綫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言論不予編入或加以删节；明明是最刻毒的借古諷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論，故意避重就輕地列入其他部分；《燕山夜話》在全国的恶劣影响，只字未提。相反，把某些并非要害問題的内容，大事鋪陈，煞有介事，企图化大为小，蒙混过关。尤其是隐藏了这样的事实：邓拓、吳晗、廖沫沙这个时期所写的大批向党进攻的文章并不是各不相同的“单干”，而是从“三家村”的合伙公司里抛出来的，有指揮，有计划，异常鮮明地相互配合着。吳晗是一位急先鋒，廖沫沙紧紧跟上，而三将之中真正的“主将”，即“三家村”黑店的掌柜和总管，則是邓拓。

毛泽东同志这样教育我們：“我們必須堅持真理，而真理必須旗幟鮮明。”（《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在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中，一定會出現種種假象，只有鮮明地高舉毛澤東思想的革命旗幟，堅持原則，堅持真理，毫不含糊、毫不吞吞吐吐地揭露事物的本質，才能不為各種假象所欺騙。既然《前綫》《北京日報》突然端出了《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的問題，又掩蓋了真相，一切革命的人們當然有責任徹底弄清楚它的反動面目。《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雖然內容十分龐雜，但一分析，就可以看到它貫穿着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綫，這條黑綫同《海瑞罵皇帝》《海瑞罷官》是一脈相承，在這幾年中國的政治氣候中刮起了一陣烏雲。現在，是到了進一步揭開“三家村”這家大黑店的內幕的時候了！

### 《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是怎樣開場的？

《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都是緊接着《海瑞罷官》開場的。它是“三家村”中經過精心策劃的、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一場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進攻。只要一看時間表，立刻可以得到異常深刻的印象。

一九六一年一月，《海瑞罷官》在《北京文藝》發表。這個戲的反動本質現在是愈看愈清楚了，它的矛頭對準廬山會議，對準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它要翻廬山會議的案。戲中叫喊“海青天”即右傾機會主義者的“罷官”是“理不公”，右傾機會主義者應當再回來主持“朝政”，貫徹他的修正主義綱領。支持右傾機會主義者東山再起重新上台，實現資本主義復辟，這就是《海瑞罷官》作者當時的迫切心情。這也是“三家

村”的“兄弟”們在当时的共同心情。

剧本一发表，立刻得到一些人的捧场和支持，“三家村”的兄弟們以为先鋒出马得胜了，欣喜欲狂，得意忘形。一九六一年一月二日，廖沫沙在《北京晚报》上摩拳擦掌地說：“腊鼓鳴，春草生”“在春季就要开始大干”。这是“三家村”的早春气候。接着，二月十六日，廖沫沙公开致信吳晗，向他“破门而出”表示“祝賀”，“以便鼓舞干劲”，并建議“‘史’和‘戏’必須分工而合作”。二月十八日，吳晗在回信中以先鋒的身份向他的“老兄”說：“也要向老兄建議，你为何不破门而出呢？”他拍着胸膛說：“你說我破门而出，这句话点着了。我就是破門而出，这个門非破不可”。好一副进攻的姿态！好一派汹汹的气势！真有点拼一拼的样子。他当时认为进攻的时机已到，抛出《海瑞罢官》之后，腊鼓既鳴，他們这一伙要“大干”一场了！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即大呼“这个門非破不可”之后一周，吳晗在《“神仙会”和百家爭鳴》一文中，大呼“一层层的神仙会，一直开到基层”，“因为基层的成員都是在实际工作中，接触实际，問題更具体，更突出，更集中”。他高喊要在基层中“怀着鬼胎”的那些人都行动起来。他高喊要“扫清百家爭鳴前进道路上的阻力”，并且得意地自我吹嘘說：“讀了四十多年书，教了一二十年大学，也写了几本书，似乎也可以算个知識分子了。”这表明，他自以为有本錢，又有后台老板撑腰，现在是他們反共的資产階級知識分子出场大施威风的时刻了。

就在这一陣陣的密鑼紧鼓声中，在《海瑞罢官》所掀起的黑风迷雾造成的“热烈”气氛中，在吳晗“扫清道路”的棍子“扫”了一陣之后，紧接着一九六一年三月，主将登台了。《燕

山夜話》“按照朋友們的建議”“破門而出”了。鄧拓說，他是“被人拉上馬的”，錯了，應該改作“被人請上馬”的。先鋒開路，“兄弟”執鞭，主將不是該上馬了么？

《三家村札記》的登台，則是緊接着吳晗《海瑞罷官》序。一九六一年八月，正是國內的反動階級加緊進攻的時期，吳晗在劇本的前言中特別指明，“這個戲着重寫海瑞的剛直不阿，不為強暴所屈，不為失敗所吓倒，失敗了再干的堅強意志”，積極鼓動、支持“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者向黨重新發動進攻。他在序言中得意地說到他的“朋友”如何為他出謀劃策，並且聲明要“拋磚引玉”，“引”出大批毒草來。接着一九六一年十月五日，《燕山夜話》中登出了一篇《事事關心》，引用了一副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十分激動地說：這“充分地表明了當時的東林黨人在政治上的抱負”，“這副對聯的意義實在是相當深長的”。東林黨是明代地主階級內部的“反對派”，鄧拓這麼欣賞“東林黨人在政治上的抱負”，是因為“反對派”引起了他的內心的共鳴。很明顯，鄧拓覺得現在陣陣“風聲、雨聲”，歪風黑雨，很不平靜，應當進一步施展“政治上的抱負”，“事事關心”，更加公開地向黨向社會主義發動進攻了！只隔幾天，一九六一年十月十日出版的鄧拓主編的《前綫》中，公開掛出了“三家村”的牌子，把暗地里的地下工廠變成一個公開的合伙公司，集中三家的火力，開始幾期就射出了《“偉大的空話”》等等極其惡毒地攻擊黨中央的領導的炮彈。

《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的出場表明，這是《海瑞罷官》拋出之後有步驟有組織有指揮地向黨繼續進攻。要把“三

家”的作品密切联系起来，才能彻底揭露这家黑店的内幕。

### 一条黑线 几股妖风

邓拓自己说，《燕山夜话》的题目是这样来的：“我常常想到、看到、听到一些东西，觉得有了问题，随时就产生一个题目”。邓拓身居领导岗位，他“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呢？他“听到”的是谁的话呢？这里他透露了《燕山夜话》都是针对当前现实生活中他不满意的“问题”而发的，有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毒内容是“听”来之后再经过他编排成文的。这些文章的出发点和主题，都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有强烈的现实性，不是什么一般的“美化古人”。根据作者指出的这条线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贯穿着一条同《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一脉相承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诬蔑和攻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攻击党的总路线，极力支持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翻案进攻，支持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这条黑线随着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随着“想到、看到、听到”的“问题”不同，选择不同的攻击方向，“分工合作”，相互呼应，四面配合，掀起了一阵阵的黑浪，刮起了一股又一股的妖风。

一九六一年一月，党中央举行了八届九中全会。全会指出：“我国在过去三年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说明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鉴于农业生产连续两年遭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一九六一年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全会的公报中尖锐地

指出：“……占人口百分之几的极少数沒有改造好的地主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分子……他們总是企图复辟，他們利用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和某些基层工作中的缺点，进行破坏活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會議公报》）他們刮起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风，极力誹謗和誣蔑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咒罵党中央，妄想推翻党的总路綫。紧接着这次全会而开场的《燕山夜話》，为企图复辟的資產階級分子和地主階級分子的政治需要服务，利用由于严重自然灾害而产生的某些經濟上的困难，集中地掀起了一股攻击总路綫和支持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复辟活动的妖风。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六日，邓拓提出了“欢迎‘杂家’”的口号。这些“杂家”是什么人呢？据他說就是“有广博的知識”、“杂七杂八地包罗万象”的人。他还說：“旧时代知名的学者，程度不等地都可以說是杂家”。他警告党說：“現在我們如果不承认所謂‘杂家’的广博知識对于各种領導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那將是我們的很大損失。”請注意“領導工作”，这是要害。很清楚，从上面邓拓的話看，这个“杂家”就是那些沒有改造好的資產階級分子、地主階級分子及这些階級的知識分子，就是一撮政治面目不清的人物，就是地主資產階級“学者”之流的反动物物。邓拓文章里当作大菩薩抬出来的帝王将相、三教九流、封建頑固、直到风水先生这些“杂七杂八”的死人，都是“杂家”祠堂里的祖宗牌位。他們以自己的“知識”为資本，正在拼命混进来或爬上去，篡夺各級領導崗位，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邓拓要我們重視“杂家”对“領導工作”的“重要意义”，就是要党向他們开门，让走資本主义

道路的“杂家”来夺取“各种领导工作”的领导权。同时抓取“科学研究工作”即学术界、思想界的领导权，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舆论。他自己就自命为一名头号“杂家”。当时有些资产阶级分子，不正也跃跃欲试地要“领导”“重视”他们进行资本主义剥削的“广博知识”吗？他们不是想用自己这种“知识”使社会主义企业变质为资本主义企业吗？“欢迎‘杂家’”这个口号，是“三家村”为了支持剥削阶级分子篡夺领导权而提出的，不要以为这只是一句空话。“三家村”里的“杂家”们不是果然把持了一批“领导工作”吗？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三日，在《堵塞不如开导》一文中，邓拓再一次要求对“一切事物”都要“积极开导使之顺利发展”。如果“堵塞事物运动发展的道路”，就“注定会失败”。请注意“一切事物”，即包括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黑暗的事物。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要堵塞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我们要支持一切革命的新生事物，就一定要打击反革命的腐朽事物。“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开辟革命的洪流，就要堵塞反动的逆流。邓拓却要求我们对“一切事物”即包括反社会主义的事物也不要“堵塞”，也要“使之顺利发展”，这不是明明要我们实现资产阶级自由化，向正在刮起来的“单干风”“三自一包风”……屈膝投降吗？“开导”就是开路，他们自命为资本主义势力的“开路先锋”。“三家村”估计社会主义要“失败”了，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黑风“必然会胜利”了，他们可以公开地投靠“发展”资本主义的反动势力了！

一九六一年四月三十日，在《爱护劳动力的学说》一文中，邓拓赤裸裸地攻击我们“不爱护劳动力”，把无产阶级专政和

地主階級專政相提并論，說什麼“早在春秋戰國及其前后的時期”，剝削階級“通過自己的統治經驗”“發現了勞動力消長的某些客觀規律”，計算出“各種基本建設所用的勞動力”的限度。鄧拓要求“我們應該从古人的經驗中得到新的啟發，更加注意在各方面努力愛護勞動力”。誰都知道，我們是最愛護勞動力的，中國共產黨的一切工作，都是從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的，都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而歷史上一切奴隸主階級和地主階級，從來只會對勞動人民進行貪得無厭的、永無休止的殘酷剝削，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奴隸和農民的大起義，他們怎麼會認識什麼“勞動力消長”的“客觀規律”呢？這不過是利用當時我們因自然災害而造成的暫時困難，誣蔑總路綫、大躍進是不“愛護勞動力”，要我們放棄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綫，放棄大辦農業，放棄執行奮發圖強、自力更生的革命方針，用地主階級的所謂“統治經驗”來瓦解無產階級專政。這就是說：你們搞自力更生是“力不勝任”的，是“過於勉強”的，趕快下馬，趕快放棄，還是照地主階級“雜家”們的老辦法辦事吧！這不是明明配合美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的惡毒攻擊么？如果照了這條路綫去做，我們不但沒有大慶和大寨，沒有原子彈，而且會淪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地！

決不是偶然的，就在這篇文章發表前后，鄧拓竭力鼓吹向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學習。他在《交友待客之道》一文中，鼓吹要“學習”“團結”“比自己強”的國家，“要歡迎朋友比自己強”。《從三到萬》一文里，又咒罵什麼“如果自命不凡，看到入門很容易，就把老師一脚踢開，那末，他就什麼也學不成。”這

是恶毒攻击我們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要求把修正主义請进门，引狼入室。我們要学习世界上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設的經驗和教訓，但是决不能学修正主义。我們热烈欢迎一切革命事业的大发展，但是决不能去欢迎修正主义。邓拓一系列的指桑罵槐，同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的腔調一模一样，誣蔑党的社会主义建設路綫是“勉强”的，只有“学”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道路，在中国搞修正主义，才有“出路”。

在掀起这股妖风的时候，“三家村”一方面竭力为牛鬼蛇神的出籠呐喊助威，大力开路，里应外合；一方面配合国内外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恶毒的攻击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为现代修正主义涂脂抹粉，妄想为右傾机会主义分子重新登台制造輿論。

一九六一年六、七月間，“三家村”又吹起了一股大妖风。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高举总路綫的紅旗，在同国内外反动派的尖銳的斗争中，在同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斗争中，引导着中国人民繼續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胜利前进。这时，国内的反动势力，被“罢”了“官”但不甘心失败的右傾机会主义者，正在进一步刮起“翻案风”，想否定廬山會議对他們的批判，否定解放以来历次重大的政治斗争的成果。“三家村”里的“兄弟”們，这时向党中央射出了密集的支持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的毒箭。

一九六一年六月七日，吳晗在一篇以紀念于謙为名的阴暗文章里，又提出了一个“誣告”的案件，大大把被“罢官”的于謙吹捧了一通，說他“性格刚直”“生性朴素”“永垂不朽”，特別提出于謙“名誉恢复了”，“于謙的政敌都先后失敗”，并另外注

明他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国防部长)”。“恢复名誉”是今天我们的语言，皇帝根本不会说这种话。吴晗不过用来透露他的一种心情：无产阶级革命派就会“先后失败”，很快就要为右倾机会主义者“恢复名誉”了！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紧接着吴晗提出于谦的案子，邓拓又发表了《陈绶和王耿的案件》。这篇文章是这样的恶毒和露骨，作者心中有鬼，根本不敢收进《燕山夜话》集子里。我们是从发表《燕山夜话》的《北京晚报》上找到的。作者说这个“掌故”可以“打开人的思路”，才把它从旧书堆中翻出来。文章隐喻地说了一个“故意夸大和捏造的”“案件”，画龙点睛在最后一句：“宋代政府在明肃太后临朝期间，吏治已经日趋腐败。上边用人行政没有精明强干的宰相和他的僚属认真负责；下边的地方官吏则为所欲为”，以至造成了“这个案件”的“扩大化和复杂化”。这是用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腔调，恶毒的诬蔑我们的党，借攻击“明肃太后”“宰相”为名，刻毒咒骂我们党中央，用“为所欲为”的“下面的官吏”来刻毒咒骂党的各级干部，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其他反党分子喊冤。甚至连“扩大化”这种现代的字眼也喊出来了！要“打开”什么“思路”呢？不就是要打开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其他反党分子“翻案”的“思路”吗？不就是要打开牛鬼蛇神攻击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路”吗？尤其耐人寻味的是，邓拓把“翻案”的希望寄托在有一个“精明强干的宰相”登台夺取领导，这是在呼唤什么脚色上台，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正是“三家村”中的主将的口气。不收进集子里，只是“欲盖弥彰”，更加引人注目！

在此同时，邓拓还在《两座庙的兴废》中，对“两座庙的一

兴一废”大大发了一通“感慨”。一座庙香火盛了，“远近聞名”；另一座庙却“废”了，“一直无人理睬”。为怕別人不懂，特別要我們推及“其他类似的事情”。这就是指我們对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太冷淡了，沒有人再去烧香了。邓拓对那些从政治舞台上倒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烂泥菩薩，对那些被党和人民彻底唾弃的右傾机会主义者和其他反党分子“一直无人理睬”的遭遇，表示强烈的不滿，要党重新“重視”他們，把“废”了的菩薩重新供起来！

紧接着，吳晗在《海瑞罢官》的前言中就更露骨地喊出“海瑞丢了官，但他并不屈服，不丧气”，叫囂要有“不为失敗所吓倒，失敗了再干的坚强意志”了！这是“三家村”当时的共同呼声，决非孤立事件。他們不但鼓动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再干”，而且自己“干”得更起劲了！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三家村”里抛出了十分恶毒的反共文章《专治“健忘症”》。这篇文章恶毒誣蔑党的負責同志患了“健忘症”，“见过的东西很快都忘了，說过的話很快也忘了”，“自食其言”，“言而无信”，“喜怒无常”，要“用一根特制的棍棒，打击病人的头部，使之‘休克’”。这不但同右傾机会主义者仇恨和誣蔑党中央的語言一模一样，而且簡直要想把无产階級革命战士一棍子打死。这多么狠毒！他們不是很想把革命者打死打昏，让修正主义上台么？这篇文章赤裸裸地暴露了他們对党充滿了刻骨的階級仇恨，完全是站在地富反坏右的立场上攻击我們的党！

上面一連串的事实，确凿地証明了《海瑞罢官》不仅代表吳晗一个人的政治态度，而是“三家村”集团支持“罢”了“官”

的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政治活动的一个前奏曲。这个集团中一小撮人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夺取党和国家的权力上，煽起了一股逆流。然而，“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誣蔑和攻击，絲毫无損于党的伟大光輝，只能暴露他們的罪恶面目，激起人民的憤怒，被党和人民所唾弃。

从《三家村札記》开场到一九六二年三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會議的时期，“三家村”的进攻，可以說是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这时，首先是国际上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进一步掀起了囂张一时的反华大合唱。一九六一年十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苏共领导把他們自己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修正主义路綫形成完整体系，进一步推行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复辟資本主义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綫。在国内，企图复辟的反动階級和他們政治上的代理人，利用我們連續三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在政治、經濟、文化領域中发出了更加猖狂的全面进攻，妄想在我们执行“調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針的时候，顛覆党的领导，顛覆无产阶级专政。

最能代表“三家村”在这段时期对形势估計的有两篇文章：一篇是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吳晗的《說浪》。他以抑制不住的狂热心情，热烈欢呼“这半年多来”冲击着社会的一股“浪”，他高兴地喊叫“这股浪头可真大”，把一股冲击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逆流，当作“浪”的成績而大行鼓吹。他对今后形势的估計是“浪头”将“越来越大”。吳晗利令智昏地认为：他們这一伙人会胜利，修正主义的逆流即将变成主流。不久，